

彭真在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角色和活動 (1941-1945)*

鍾延麟**

關於彭真在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用問題，中共官方的相關論述往往是避重就輕，以保持其崇高的形象；學界雖然對之有所注意，但也無一專題研究。本文指出：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的過程中，彭真是其倚重的一名要角。在中央高層整風方面，彭真雖然黨內資歷和地位並不突出，但強力地協助毛對所謂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進行政治批判和施壓，也為毛製造出場善後、收攏人心的機會。在中央黨校整風方面，彭真對在校學習的高級幹部和各地代表致力推銷以毛為具體化身的正確路線，唾棄與之對立的錯誤路線和人士，從而鍛鍊、監製一批對毛忠誠不貳的高階「馴服工具」，作為其後續對內領導和對外統治的中堅骨幹。彭真在整風期間展開的審幹運動中(特別在中央黨校)，由於對敵情的失實估計和對敵特滲透政策的偏聽輕信，再加上採取訴諸群眾運動、私刑逼供的審幹方式，一度造成錯整冤枉、

* 作者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先生、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研究員，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研究人員，曾對本文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並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105-2628-H-004-006-MY2)。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地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No.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傷害無辜的惡性局面。本文首度重建了彭真主持黨校審幹的相關政治過程和細節。彭真賣力投入延安整風運動，鼎力助毛在黨內取得如日中天的領導地位；此一運動影響及其模式，後來不但長期籠罩中共政治，終而也讓彭真在政治上遭受滅頂之災。

關鍵字：彭真、延安整風、審幹運動、搶救運動、毛澤東

一、前言

彭真(1902-1997)是中國共產黨一名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在中共發展的各個時期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在中共尚未執政以前，彭真活躍於華北，之後更在延安進入黨的首腦機關，政治上比後來聲名顯赫的鄧小平還早發跡；在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彭真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過程中，每每狀若先鋒，「文革」前夕甚至權傾朝野，但不久即黯然垮臺；在「改革開放」時期，彭真以其黨內資歷和歷史聲望，也位屬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國「八大元老」之列，參與國策、呼風喚雨。

1940年代前半期的延安整風運動，乃是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成功地讓中共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並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共後來與國民政府逐鹿中原，進而取得勝利，正與它經過整風達致內部團結、心志齊一密切相關。在為期數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彭真在其中的政治角色和作用，並非無足輕重。彭真去世後，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的紀念文章就提到彭真「參加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也高度肯定他在其中的「重大貢獻」：將全黨思想一統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領導思想之下，也有助培育養成黨的「領導骨幹」。¹事實上，這也成為中共官方後來為彭真編寫傳記、年譜，涉及到延安時期歷史的評價基調和內容主軸。

但值得玩味的是，彭真的官方傳記很少記述其傳主如何具體參與中央高層的整風，特別是他怎樣對待整風主要批判的高級幹部，倒是簡短摘要收錄彭真在1954年高層會議上的發言，自承當年整風對人態度不佳、批評欠妥。另外，官方傳記不惜筆墨地記錄彭真在整風期間領導中央黨校的情形，但當論及運動激進的階段，彭真卻幾近消聲匿跡，好似人已不在其職。²這種迴避緊要細節、淡化敏感言行的處理手法，反而令人更加好奇彭真在高層整風批鬥和黨校運動偏激中究竟所為何事，需要如此遮蔽和掩蓋。

¹ 〈彭真同志光輝戰鬥的一生〉，《人民日報》(北京)，1997年5月3日，1版。

²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卷，頁248-286。

延安整風歷史的研究者如陳永發、高華和何方，在早年資料稀缺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嘗試分析彭真在整風運動中的角色，並難能可貴地勾勒出彭真在運動過程中的特殊分量和負面作用。陳永發表示：「彭真不僅應為延安整風、審幹和肅反之中的偏向負主要責任，而且根本和康生一樣，是毛澤東最信賴的助手之一。」他還稱彭真是「搶救運動的巨頭」、「不見得沒有犯過康生的錯誤」。³高華指稱：彭真「全面掌管全黨高級幹部培訓兼審查中心的中央黨校」，因而是毛澤東、劉少奇、康生以外的「其他幾個重要角色」之一；何方指出：彭真在延安「得到毛澤東的高度信任和超常重用」，在「製造個人崇拜上立了大功」，也將中央黨校「整成『重災區』」。他們的論著既激發本文的寫作興趣，也對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認識基礎。

然而，彭真官方傳記不欲正視、多說的彭真如何參加延安高層和黨校整風批鬥的問題，陳永發、高華、何方也多僅予論斷或概述而已。例如：彭真如何具體作為「搶救運動的巨頭」？中央黨校如何經其之手被「整成『重災區』」？陳永發和何方點到為止、未作深論。高華的著作在三人之中對彭真著墨最多，但也沒有對他在高層整風和黨校審幹、「搶救」的個人面貌加以深挖和細描。另外，高華極為強調延安時期毛澤東、彭真關係背後的劉少奇因素——毛澤東之所以重用彭真，是因為彭真是劉少奇的人馬，毛澤東欲借助劉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整肅異己；彭真之所以貫徹毛澤東的整風部署，是因為劉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澤東的力量，整肅政敵。⁴這種將彭真和劉少奇關係簡化看作是忠貞不移、對外封閉的政治派系，以及忽視毛澤東和彭真之間在延安直接互動、發展密切政治關係的論點，亦過於粗略、疏漏。⁵

³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92、137、158。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09、311。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355、538。

⁴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382。

⁵ 關於劉少奇、彭真之間的政治互動、關係性質，以及其對延安整風的影響問題，本文因主題設定和篇幅限制，在此不予展開討論。相關討論請參閱：鍾延麟，〈彭真與劉少奇政治關係之研究（1928-196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8期（臺北，2017.11），頁135-188。

近年來相關各類歷史資料的逐漸面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前述學術著作成書時面臨的資料嚴重匱乏困境，使得對延安整風中的彭真進行一專門的細節研究成為可能。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過去未曾與毛澤東共事的彭真，為何可以獲得毛的高度信任參與領導整風運動？彭真對中央高層整風的參與情形如何，又如何指揮中央黨校各階段的運動發展？他在高層和黨校運動的激化發展中從事什麼活動？彭真在整風中的表現如何使之進一步贏得毛的歡心和重用，襄助、促成後者在黨內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以整頓不良之風和整肅不肖之徒的過程中，彭真無疑是他最器重的幫手之一。在中央高層整風中，彭真在黨內雖屬後進之士、也較少與聞早期決策和人事，但對於遭毛鎖定的人士批判猛烈，從「教條主義者」到「經驗主義者」無一放過，助毛振勢立威、屈人之兵。毛將高級幹部和地方代表集中於中央黨校，以對之進行整風洗禮和忠誠審查的計畫，更是專門倚賴彭真。彭真不負所望，在黨校整風學習中，突出毛的政治正確和威信，務使人心以毛為所向；在黨校審查幹部上，他既知其乃毛提倡反內奸的重點單位，也爭作先進標兵，不願輕饒縱放。延安整風過程中，彭真在確立毛的中心領導地位、確認上層思想純化和確保組織純潔等方面居功甚大；作為政治酬報，彭真成為中共政壇急速躍升的一顆政治之星。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重建彭真個人一段具有重要政治影響、卻長期被刻意遮掩、模糊處理的歷史，並且對認識中共延安整風運動過程和相關政策，以及早期的高層菁英關係和中央黨校發展有所裨益。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年譜、傳記、回憶資料、「文革」批判資料、訪談資料，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⁶

⁶ 從事中共歷史研究，尤其是事涉敏感的重要歷史議題，最經常遇到的困難即是原始檔案的難以獲得。這主要肇因於中共官方的嚴格管控，其目的顯然是藉此限制、阻礙和反對針對有關歷史的深入探查和細緻重建。本文主題直接關乎延安整風期間的爭議過程和人際衝突問題，更是直接遭遇這種人為刻意製造的資料困境；但是作者並未因此止足不前，也沒有對之視而不見。本文為了部分彌補欠缺原始官方檔案的遺憾，盡可能地蒐集、綜合和使用各類文獻；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承認和注意各種資料本身的問題和不足，也細心彼此對照和比較；分析時也注重文獻資訊與相關歷史背景、氛圍之間的契合度，並與基於因果邏輯推論的「理據」相互參照。最

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八個部分：首先是介紹彭真何以進入毛澤東的政治眼簾，成為其領導整風的重要助手，以及他對整風初期的參與情形。接下來依時序探討彭真如何推行審幹反奸，以及怎麼深度參與其之極化發展——「搶救運動」和接續的隔離審查(主要聚焦在中央黨校)，然後他又回頭在高層整風鬥爭中扮演何種角色。之後討論彭真如何協助運動收場，並評估何以他的運動表現得以榮獲毛的聖眷而政治地位猛進？在結論的部分，簡單探討彭真在「文革」前對運用延安整風模式和看待延安運動經驗問題的態度。

二、彭真參與延安整風的初期情形(1941年至1942年中)

(一)毛澤東政治上看中彭真的原因

彭真從 1923 年入黨到 1941 年赴陝北延安參加整風之前，可略分為三個階段：一、在前六年，他主要在山西、天津和河北從事工人運動。二、1929 年彭真被逮捕。河北省高等法院根據《反革命治罪暫行條例》與《防制共產黨辦法》等，將彭真判刑九年；之後同一法院根據國府的《政治犯大赦條例》，將其刑期減至六年。彭真坐牢刑滿六年後，方於 1935 年出獄。⁷三、彭真走出牢房出後，先協助劉少奇重振和擴展中共在華北的勢力；對日抗

後，作者也強調：本文倚重現有可得資料所做出的學術判斷，自有侷限性，有待日後其他重要文獻面世，再予進一步地檢驗以至修正。

⁷ 彭真因為從事共黨活動，遭受六年牢獄之災。這段入獄經歷，對彭真日後的從政之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評價和影響。彭真在獄中並未放棄抗爭，而且是在服刑期滿後才被放出，所以當其回到中共革命隊伍中，其坐牢一事被看作是政治歷經考驗、對黨忠心堅貞的具體表現；另外，中共黨內在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前半期的政治摸索、紛爭和失敗，彭真因為身處大牢而無涉入太多，使之少有歷史「欠賬」。這些在延安整風階段對彭真是一個政治上的利多。然而，中共內部存在一種對於在敵人佔領區工作者有所不信任的情緒，對於曾被敵人捕獲下獄者更是懷疑(弔詭的是，彭真本身曾在敵戰區工作、也有被捕坐牢的經歷，但是他在延安審幹時竟對類似經歷者嚴加審查)。這一狐疑、敵視的情緒在「文革」期間更極端發展為：早年有坐牢經歷者，甚有可能遭到指控曾經叛黨、變節。此時已成「階下囚」的彭真，就吃盡苦頭，申辯多次無效。

戰開始後，他同聶榮臻開創並建設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彭真和毛澤東初次見面是在 1937 年中延安召開的黨全國代表會議。彭真作為白區代表團團長與會，與毛相談契合，咸認為要按照中國的情況推行革命。在緊接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彭真傾向支持劉少奇的看法，對過去白區工作給予較負面的評價，雖然遭受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和多數與會者的反對，但卻得到毛的聲援。彭真與毛接觸後認為：以毛的見識、視野和領導能力，可作為黨真正的領袖。毛也認為彭真「很有水平」。⁸

1938 年秋，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建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團隊，彭真積極擁護；1939 年初，彭真同關向應在晉察冀邊區率先提出「毛澤東同志萬歲」的口號，作為中共黨內的首例；彭真對此也頗為自豪並自我標榜。⁹1940 年 4 月，彭真亦對預定前去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七大」）的晉察冀代表團表示：「毛主席是正確路線的代表」。¹⁰

彭真在晉察冀的工作表現，也愈加受到毛的激賞。前述共產國際指示下達後不久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彭真介紹晉察冀的工作經驗，毛聞後提議發電肯定該邊區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1940 年初，毛澤東將其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贈予彭真；後者在同年夏即提出要在晉察冀「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更據此指導該地的各項工作，成績斐然，猶如為毛發明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創製一個成功的樣板。¹¹

1941 年 1 月，中共中央決定彭真前來延安參加「七大」。彭真抵達後，從 6 月 4 日至 8 月 21 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7 次彙報晉察冀各方面的政策和工作。毛澤東對彭真的報告高度肯定，除了安排後者在黨政軍機關廣作演講，也用中央的名義，以《晉察冀邊區的各種具體政策及黨的建設經

⁸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黨史文匯》，第11期（太原，2012.11），頁21。

⁹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51期（香港，2013.04），頁137。

¹⁰ 阮泊生，〈我對七大重要意義的理解〉，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上冊，頁392。

¹¹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108-109、116-117。

驗》為題接連批轉各地黨委參閱；另外，毛也囑咐彭真將相關報告內容整理成冊，在是年底出版發行。¹²經過 1941 年下半年延安密集的亮相和造勢後，彭真聲名大噪；他雖尚不具中央委員資格，自此也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

毛澤東在延安對彭真的有心提攜，自然是基於對後者忠貞效己的回報，以及對其工作能力的肯定——毛澤東尤其激賞彭真對晉察冀的經營有成，以及他對相關具體政策和管理經驗的系統整理與總結，並懂得用毛的理論文字加以包裝和呈現，使之兼具實際操作價值和理論指導意義，毛甚而譽之為「是馬列主義的」。¹³劉少奇 1938 年底前去指導華中工作後，毛身邊正缺人手，彭真既忠實又能幹，即可派上用場。另外，彭真還具有很高的政治「塑造性」。彭真自參加中共革命後，活動範圍都在北方，對於黨中央在南方的活動情況和其中的人事往來，都不甚了解、也無利害糾葛。毛可藉由交談的機會和交心的方式，對彭真灌輸其對黨內上層政治和歷史的看法。出於對領袖的崇尚和對之器重的感激，彭真不難、甚至是悅於接受毛的觀點。彭真有話就說的直爽特性、自認擇善堅持的剛硬性格，使之成為毛可以培養、利用的貼身近臣，進而為毛在隨後發起的整風運動服務。

(二) 參與第一次高層整風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批評主觀主義——表現在不注重研究中國現狀和歷史，以及不思應用革命理論，並且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制度的任務。¹⁴之後毛澤東在系統回顧 1928 年中共「六大」以後的歷史發展和政策文件後，深感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過去對黨造成的重大危害和破壞，便在同年 9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動首次的高層整風，大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代表人士。

9 月 10 日，毛澤東在這場通稱為「第一次九月會議」的首日，痛批李

¹²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43-246。

¹³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45。

¹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中卷，頁298。

立三代表的「立三路線」和博古、張聞天當政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毛強調：兩者相較之下，後者的錯誤更為嚴重，因為「它的型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¹⁵博古和張聞天聞後皆坦承犯錯、低首檢討。其他與會者紛紛表態呼應毛的論調，批判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彭真也不例外。

彭真在 9 月 12 日發言：「克服主觀主義是決定我們黨的生死問題。反主觀主義的鬥爭不只是從今天開始，今天反主觀主義鬥爭是在中央領導機關開始決戰。」「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完全失敗，蘇區工作大部分失敗。這是主觀主義的嚴重惡果」。¹⁶他還表示：

黨的六大後一個時期，華北工作路線是正確的，爭取群眾，積蓄力量。後來形成立三路線，反對北方落後論，要在北方到處組織暴動。六屆四中全會後，(北方)各大城市繼續組織暴動。六屆四中全會在組織上打擊了許多人，中央蘇區打擊了許多人，這是嚴重的宗派主義。¹⁷

無論是「立三路線」和所謂「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橫行之時，彭真幾乎都在牢中而無緣親歷，也根本未曾踏足中央蘇區。彭真主要是重覆毛澤東設下的政治基調和歷史解釋。對毛澤東而言，彭真的發言可在高層整風中起到搖旗吶喊、以壯聲色的效果。

另外，彭真在主觀主義當道時「涉世未深」，卻還虛心檢討：「我雖然教條主義不多，但自己好崇拜教條，所以，容易做人家的俘虜。」¹⁸正可反襯出同日發言的王明的迴避自我責任、意圖蒙混過關。毛澤東發起高層整風，設定的檢討對象除了博古、張聞天，還有王明。但是王明並無像博古、張聞天低頭認錯，反而對他們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對自己的責任則蓄意閃躲。王明相關舉動已是惹人不快，他又錯判情勢，在 10 月初竟反過來批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王明的反撲激起其他與

¹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頁326。

¹⁶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卷，頁198。

¹⁷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49。

¹⁸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50。

會者的嚴加批評，王明見政治氣氛苗頭不對，便趕緊上呈書信告降，稱病請假不出。毛澤東領導的首次高層整風，在成功降服博古、張聞天和逼降王明後，也暫時鳴金收兵。

毛澤東心曉王明經過此次高層整風雖然口頭稱降，但也是口服而心不服；另外，整風過程中也暴露出許多歷史情況和人事問題尚待澄清。毛因此決定成立兩個委員會：一、毛親自領銜的歷史委員會，旨在清算黨史以深入揭露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造成的路線錯誤；二、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為首的審查委員會，意在審視過往幹部遭到政治迫害的情形，以揭發宗派主義過去如何害人不淺、殘害忠良。彭真跨足兩個委員會外，也開始過問中央黨校工作。

(三) 中央黨校改組和開始整風

毛澤東在 1941 年秋高層整風初步告捷後，想進一步地將更大範圍的幹部「納入其思想軌道」，這即是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全面登場的重要來由。毛發起整風的目標，主要在批判和革除「教條主義」的毒害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影響，最終讓全黨的思想一統在其個人旗下。¹⁹毛澤東希望中央黨校能成為推展整風運動、改造重要幹部思想的重要平台，他擇定彭真作為改造黨校的幫手。

1941 年底，按毛澤東和彭真的設想：一、要將各地前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編入中央黨校，中央機構也選調高級幹部赴黨校學習，如此一來大幅提高黨校在培育重要幹部的職權和地位。二、提出「黨校教育的目的主要為培養具有理論及獨立工作能力」的幹部；為糾正「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著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課程必須加以調整。²⁰

1942 年 2 月 1 日，中央黨校新學期開始，學員人數約 300 至 400 人，依幹部級別和知識程度分為兩個科(部)。毛澤東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學

¹⁹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116。

²⁰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203-204。

風黨風文風〉講話，表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2月8日，他又在中央宣傳部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²¹

毛澤東欲將中央黨校改頭換面、並從中開展整風的心意，黨校學員如前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就滿心期待；²²反倒是黨校校長鄧發紋風不動，課程安排如昔。2月底，毛澤東決定再次改組中央黨校，並要彭真扮演更實質、重要的角色。主要變動有：中央黨校停止原訂課程，改而學習黨的路線問題；高級的政軍幹部參加黨校學習；黨校直隸於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負責政治領導；鄧發仍任黨校校長，彭真則出任教育長，校的日常工作由鄧發、彭真、林彪組成委員會管理。中央黨校此番改組的本身，直接反映了毛澤東在政治上對鄧發的不滿和不放心，鄧發雖保有校長之銜，但「已不起主要作用」。再加上，林彪沒有到任，黨校具體的領導工作，特別是其整風運動，就交由彭真負責。²³

彭真在延安政治地位的勁升，以及他在毛澤東之下主管中央黨校整風的情況，進一步地體現在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和分工上。1942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以全面領導和統籌整風運動。總學委的正、副主任是毛澤東、康生，委員有陳雲、高崗、彭真和李富春(6月，中央決定總學委與中央書記處合併舉行)。另外，總學委在延安地區成立數個學委會，其中一個是中央黨校分區學委會，負責人是毛澤東和彭真，而非鄧發。²⁴

彭真確能領會和掌握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發動整風的企圖，明言黨校改組就「是使黨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頓三風的精神」；²⁵他也積極地向學員宣揚毛澤東，要他們在面對延安的各種思潮和複雜情況時，「聽毛主席的話，擁護毛主席的主張」。²⁶在彭真的領導下，1942年起，中央黨校人員

²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頁359-362。

²² 張宣，〈我經歷的延安整風運動〉，《紅岩春秋》，第3期(重慶，2000.03)，頁4。

²³ 王漁，《回憶中央黨校》(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頁52、175、177。

²⁴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58。

²⁵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211。

²⁶ 周太，〈赴延安參加七大的經歷〉，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

開始依序進行整風學習：首先學習中央的整風指示，以明瞭整風的意義、目的和要求；繼而瀏覽閱讀中央指定的整風文件，了解其內容要義；接著精讀整風文件，詳作筆記和深入討論後，開始與自身的工作、思想進行連結和省思；最後深度檢閱工作與自我檢查思想，撰寫完成學習的總結報告。²⁷

在此一過程中，彭真經常講話鼓動、撰寫社論解釋，對下勤加指導，讓黨校幹部和學員在運動中有所遵循。²⁸在中央黨校尚屬平靜的整風學習階段，校園內一度看似營造出積極向學、活潑寬鬆的氣氛；學員也有感自身思想認識的提高，以及理論、工作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愈加體認和服膺毛澤東在理論、歷史和政治上的卓越見識和超凡領導。

三、審幹反奸的推行(1942年中至1943年春)

毛澤東開啟整風運動之後，各級人員在學習、檢查和交代的過程中，供出大量關於自身和他人的政治資訊，這為黨進一步辨識、審查黨員與幹部的思想脈動和經歷活動，提供重要的條件和機會。毛澤東和其手下的整風幹將覺得機不可失，同時也可以藉之設標立靶，導引整風走向，便將審幹納入整風的議程，甚至與反制敵人滲透的任務結合。在毛澤東的運動戰略佈局中，彭真代之操管的中央黨校，學員身分非同一般，自要先「試水溫」，見有績效以後，再行鋪展。

(一)反奸政策的醞釀和出台

延安整風開始後，聚集知識分子的中央研究院，出現了對延安存在特權、不平等現象的不滿，其中，王實味批評最力、也引起較大的迴響。毛澤東把王實味選作激化整風的突破口，在康生的介入處理下，王氏被指控

大代表憶七大》上冊，頁390。

²⁷ 曹冠群，〈我得益於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收入延安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第1集，頁60-61。

²⁸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59-262。

為「反革命分子」。1942 年春夏之交成形的王實味案，令延安整風運動轉趨緊繃，帶有反奸細任務的審幹工作也伴行開展。

彭真除了讓中央黨校派員「見習」中央研究院如何批鬥王實味，也秘密觀察校內有無學員為「王實味之流」「張目」。²⁹1942 年下半年，他在黨校內開始豎立批判標靶，以使校內整風批鬥有方向可循。具體的例子有：批判曾與王明在莫斯科共事的李國華，將之當作「教條主義」典型；批判曾任周恩來政治秘書的吳奚如，稱其具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思想」。不久之後，彭真更在一次大會上突然宣布：獲自重慶方面的密電，證明吳奚如乃屬敵方分子。令在場的吳氏大感吃驚、不覺發抖。³⁰

1942 年 12 月召開的中共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除了將高崗樹立為中共在西北的正確路線代表，並且確立其在西北局的領導地位，也大幅推進審幹反奸的工作。毛澤東在此會上將吳奚如和王實味並舉，強調「兩個反革命的人在延安反革命」。³¹吳奚如後來指控：毛澤東「當年誤信康生和彭真的謊報軍情，在西北局高幹會上，宣佈我是『叛徒和特務』也。」³²1943 年 1 月 4 日，彭真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反奸肅反」的講話時，也以吳奚如案為例，介紹如何進行對「反革命」的鬥爭。³³亦即將之當作黨校整風審幹的成功經驗大加推揚。

1942 年 11 月，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強逼甘肅青年張克勤「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打入甘肅黨的特務。康生進而認定國民黨實行「紅旗政策」，亦即有計劃地鑽進、篡奪國民政府統治區內的共黨組織。需要關注的是，在相關的政治認知上，彭真與康生的相仿。

康生泡製「張克勤事件」後，根據曾任中共四川成都市委書記的張宣(其赴延安後，先待在中央黨校學習一陣子，再分配至西北局下屬的西北黨校擔任教員)

²⁹ 趙石，〈難忘的延安歲月——紀念七大六十周年〉，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233。

³⁰ 王明遠，〈參加七大的前前後後〉，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159。

³¹ 散木，〈吳奚如的風雨人生〉，《文史精華》，總217期(石家莊，2008.06)，頁23。

³² 李向東，〈涉及吳奚如平反的幾封信〉，《炎黃春秋》，第9期(北京，2007.09)，頁74。

³³ 散木，〈吳奚如的風雨人生〉，《文史精華》，頁23。

的說法：1942 年 12 月，彭真領導的中央黨校派出張平化、孫志遠進駐西北黨校，和高崗主政的西北局攜手合作，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栽贓張宣為國民黨特務，並對他連續審訊 8 天，要之俯首「認罪」。

張平化在對張宣強行逼供的過程中，直指四川地下黨是「國民黨特務機關製造的偽黨」；甚至佯稱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鄒風平已自招是特務。張宣認為「沒有中央黨校領導上的授權」，張平化不可能如此恣意妄為。張宣憤而寫信給「中央黨校負責人」「P 同志」，表達嚴正不滿，勸之改正對地下組織的誣蔑。³⁴「P 同志」在 1943 年初的回信中反勸張宣「向黨坦白交代自己的問題」。³⁵張宣不願屈服，遭到關押監禁。雖然不能遽以認為張宣口中的「P 同志」是彭真，但是如果張宣對其不幸遭遇的描述為真，這或可作為一例，具體反映彭真領導的中央黨校，對於鄒風平、張宣所屬的四川黨、以至更大範圍的國府統治區的共黨組織，在政治上可能早就有所懷疑。

1943 年 3 月底、4 月初，隨著中央權力和組織變動，以及對整風運動的新指示，彭真在中共整風、審幹中的角色愈加吃重。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身兼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在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名義下，毛還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則從黨校教育長升格為副校長，明確作為毛在黨校的唯一副手和黨校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彭真本已具體負責主持中央黨校整風工作，在有副校長的新職後，黨校之後的整風審幹工作，彭真對上直接向毛澤東個人負責，對下全面緊握，校內各級幹部和人員更是唯之是從。

4 月 3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其指出：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有二：一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此乃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另一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性質為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³⁶

³⁴ 張宣，〈為澄清一個史實致廖志高同志〉，《紅岩春秋》，第6期(重慶，2001.06)，頁59。

³⁵ 張宣，〈鳳凰驚夢——延安「搶救運動」親歷記〉，《紅岩春秋》，第4期(重慶，2000.04)，頁8。

³⁶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1943年4月3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

同月中旬，黨中央成立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具體負責後一任務。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由 1942 年底返回延安的劉少奇擔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如前所述，在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成立以前，彭真即與康生、高崗在吳奚如案和張宣案上進行協作和配合。因此，在接下來開展的反內奸工作上，彭真和反內奸委員會同僚在認識和步伐上，皆為一致。

(二)黨校擴充

1943 年春，為配合中共中央因應前方戰爭殘酷、決定抽調大批幹部赴延安「保留培育」的政策，並且有力地承擔起負責重要幹部的整風、審幹任務，中央黨校重新改組、擴張規模，重要性也更為提高。

具體的情況是：官升副校長的彭真領導校部，黃火青出任秘書長輔佐彭真。彭真與黃火青在黨校已共事一年，配合還算默契(如批鬥吳奚如)；彭真因長年在北方活動，對南方蘇區和軍隊幹部情況了解較少，黃氏在這方面可補之不足，他也將主要心力放在協助彭真管理黨校的組織和幹部問題。³⁷校部下設四個部：一部(主任古大存)，以黨校原有的學員為基礎，其中多是高級幹部和預備參加「七大」的黨代表；二部(主任張鼎丞)，也主要來自原有的黨校學員，但其屬職務地位是不符一部成員資格的中級幹部；三部(主任郭述申)，其前身即是去年抓出王實味「反革命分子」的原中央研究院；四部學員則屬出身工農、需要補習教育的中級幹部。1944 年春中央黨校再增設五部，其前身就是之前批鬥張宣的西北局黨校；後因五部人數過多，又從中分出六部。

中央黨校一部組成的學員最重要、人數也最多，彭真因而最是重視。一部副主任劉芝明後來就回憶：「一部的工作，主要是彭真、黃火青、古大存他們幾個同志親自抓」。³⁸事實上，自此以後中央黨校的整風、審幹工作，彭真最倚賴的就是黃火青和古大存。黃、古分別作為彭真在校部和一部的忠實代理人，戮力貫徹其運動指令；他倆也密集向彭真彙報情況，讓之即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第14冊，頁28-29。

³⁷ 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63。

³⁸ 王漁，《回憶中央黨校》，頁180。

時知悉情況、迅速回應情勢。校內關於整風、審幹的重要活動和場合，亦經常見三人一道出席、形影不離。

(三)校內開始審幹反奸

彭真領導的中央黨校審幹反內奸工作，乃密切配合和響應康生的政治動員。1943年4月3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關於反特務的動員報告。彭真的副手黃火青親自領隊黨校學員出席聆聽。會後，彭真為首的校部發出通知：「要大家從坐牢、被俘、地下黨、蔣區來的幹部、寫的文章、平日言行中去發現特務。」³⁹另外，黨校也宣布「關門」整風：學員不准外出、不准會客、不准通信，在校內散步時也要有人同行。已結婚者欲請假會見伴侶，校方針對來自國府統治區者，嚴格執行此一「三不准」規定，不予通融。⁴⁰其對來自地下黨的學員的偏見如此可見一斑。

中央黨校校部明確指出要從前述類別的學員中尋找特務，校領導約此前後就加緊審問魏澤同，以作為繼吳奚如之後的另一個「典型特務」。湖南籍的魏澤同在一部第5支部學習，來延安前跨足四川和湖北黨組織工作。校方看上、鎖定魏澤同的原因，可能包括：在1942年底、1943年初，彭真等校領導已對四川黨起疑，魏澤同曾作為其一員，順理成章地遭到懷疑；其次，魏澤同曾任鄂西特委書記，組織關係牽連湖北黨，其可以作為打入該黨的重大缺口。⁴¹再者，魏氏時年25歲，黨內涉歷不深、經驗不足，較好操控。為逼使魏澤同「坦白」為特務，黨校將魏澤同關進一個窯洞內進行多日圍攻，不讓其睡覺。

在魏澤同遭到審訊和逼壓的過程中，彭真可能不僅僅是被動地靜候下屬處理和回報而已。當時與魏澤同一起學習的楊第甫指稱：「副校長」曾親

³⁹ 袁學之，《難忘的回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頁103-104。

⁴⁰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87。

⁴¹ 郝在今，《「文革」前史——延安「搶救運動」紀實》（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頁70。

口威脅魏澤同：「你不要想滑過去，你的問題我天天向毛主席匯報的。」⁴²所謂的「副校長」，應是對彭真的曲筆表述。楊第甫也指出：魏澤同「被正副校長和總書記用車輪戰日夜不息搞了三天三夜，人已糊塗了，如是依着批鬥者的意圖交代問題」。⁴³如果彭真確實介入對魏澤同的「逼供信」，警告後者「不要想滑過去」，可見他對破獲此案的殷切和急盼。至於彭真若言「你的問題我天天向毛主席匯報的」，是顯示其在黨校所為皆為毛所悉、奉行其意，或者僅是狐假虎威、旨在恫嚇魏氏，就不得而知了。魏澤同最後被迫迎合校領導的心意，「承認」自己是特務、其建立的湖北鄂西黨是「紅旗黨」。⁴⁴由於魏澤同案立案較早、並且經高壓逼供下產生，魏澤同的黨校同學就說：「大家都知道的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就是從我們支部即黨校一部第5支部搞起來的。」⁴⁵

在前有吳奚如、後有魏澤同等「特務」被「破獲」後，中央黨校各支部忠心、殷勤的幹部，即開始從歸其所管的學員中進行政治「狩獵」，爭相立功。鄒風平過去曾五次被敵人逮捕，堅貞不屈；其同事張宣在西北黨校被中央黨校領導人派人誣陷為「特務」，他自身在黨校一部的審幹中自是插翅也難飛，被咬成是「特務」，令之百口莫辯。來自湖南黨、在黨校一部第11支部學習的袁學之也控訴：支部領導楊尚奎和鬥爭張宣不遺餘力的張平化，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就認定他是「鑽入」中共成為湖南黨代表，連夜強行逼認其是特務，既不讓喝水，也不准如廁。⁴⁶

綜上所言，在1943年7月的「搶救運動」高潮以前，彭真所管的中央黨校在同年的春夏之交，已開始出現逼人「坦白」為敵人內奸的情況，不但未聞彭真發聲制止，他可能還涉足參與。

另外，中央黨校在此階段的整風學習，在彭真的領導下氣氛也越發緊

⁴²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89。

⁴³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96。

⁴⁴ 王宇光，〈我對南方局正確領導的切身體會〉，《紅岩春秋》，第6期（重慶，2006.06），頁6。

⁴⁵ 趙石，〈難忘的延安歲月——紀念七大六十周年〉，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234。

⁴⁶ 袁學之，《難忘的回憶》，頁105-107。

張，其背後或也含有為行將展開的大規模審幹肅奸製造輿論的政治考量。1942 年底、1943 年初，中共中央對「紅旗黨」遍佈的敵情認知形成後，河南黨即被暗中懷疑和鎖定。1943 年 2 月，河南省委交通科長杜征遠調回延安被隔離審查，審訊人員對之明白指稱河南黨主要領導人皆屬特務。3 月，政治忠誠已被懷疑的河南黨負責人王志杰、危拱之、郭曉棠，被通知回延安的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⁴⁷中共中央是否想要彭真對之調查監管，雖然不能貿然猜測，但彭真對初來乍到中央黨校的河南黨人，不甚客氣和友善。

在同年 5 月底，中央黨校內針對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政治辯論中，郭曉棠主張歐洲在戰爭結束後將會實行一段新民主主義，不同於彭真為首的校領導所主張的隨即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為此，彭真大加批判郭曉棠的主張是政治上的「投降主義」理論。⁴⁸彭真對郭曉棠大動肝火，是否顯示其針對的不單是辯論本身，更是針對郭氏的河南黨身分？包括郭曉棠在內的河南黨人士，在不久之後的黨校審幹「搶救」中，成為被攻擊的主要對象之一，恐怕只是一個順勢的必然發展。

四、積極參與「搶救運動」(1943年夏)

(一) 主導中央黨校「搶救」

1943 年夏，國共關係一度緊張，甚至傳聞國軍將進攻延安。為防敵方裡應外合，中共中央決定加緊清查內奸。7 月 15 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召開動員大會，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延安審幹自此轉入風聲鶴唳的「搶救運動」。

彭真在 1954 年高級幹部皆被要求作自我檢討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

⁴⁷ 張文杰，〈延安整風運動中河南黨被康生誣陷為「紅旗黨」的經過及嚴重後果〉，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344。

⁴⁸ 郭青苔，〈六十三年前在中央黨校發生的一場政治論爭〉，《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43.html>)，2016年3月16日檢閱。

表示：

在「搶救運動」開始後，對「坦白」材料及其他一些關於國民黨紅旗政策、奸細政策的材料「不加分析，輕於相信，過份估計了敵人在我內部、特別是在蔣管區地下黨組織中的特務活動」，沒有分清是非輕重，分別對待，「因而把一部分人的問題搞錯了或搞重了，並且冤枉了一部分根本沒有政治問題的好同志」。⁴⁹

中央黨校的審幹步入「搶救」高潮、產生各種亂象，彭真的確責無旁貸。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前一天，也就是1943年7月14日，彭真即在中央黨校作「搶救」動員報告。彭真之後也在黨校召開數場坦白動員大會，其大體流程如後：

第一、大會宣布開始後，首先在台上推出已束手就擒、可任由擺弄的「失足者」如魏澤同，以證明敵人暗地扶植「紅旗黨」確鑿無誤，同時達致先聲奪人的震撼效果。

第二、坦白大會在擺列出已向黨「坦白」的「失足者」後，彭真宣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甚至開殺戒的政策：「特務分子坦白好的，有一個寬大一個，有一千寬大一千，有一萬寬大一萬。不坦白的，有一個殺一個，有一千殺一千，有一萬殺一萬。」據出席者回憶：彭真言畢，當場「鬧得人心惶惶」。⁵⁰

第三、經過事先的精心導演和操作，大會已設定具體的鬥爭目標，河南黨就是主要的「獵物」之一。彭真在會上動員後，有人受其「感召」、聞風而起，檢舉河南省委書記王志杰；王嚴詞否認後，馬上又有人接著上台指控。這種接連而來的告發，明顯是校領導已預先安排的結果。⁵¹彭真限時要王志杰交代並表示：「你要爭取從新做人的機會，不要錯過良機。」王堅稱自己就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不願「承認」「失足者」身分。彭真見王

⁴⁹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84。

⁵⁰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89。趙石，〈難忘的延安歲月——紀念七大六十周年〉，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234。

⁵¹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89。

志杰不從，憤然指令將他捆綁起來。⁵²彭真領導的大會緊接「搶救」河南省宣傳部長郭曉棠。郭曉棠在黨校不久前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政治辯論中，已被彭真狠加批判，這時更成為彭真的「待宰羔羊」。彭真指名郭曉棠的舊屬登台對之進行揭發，郭曉棠一一據理駁斥。看到郭氏如此「不受教」，彭真失去耐性，當場大喝一聲，下令將之捆綁。台下目睹此情此景者，「感到殺氣騰騰，不寒而慄」。⁵³

既然彭真在坦白大會上公開質疑、批鬥河南黨的主要領導人，黨校內對河南黨人也予以暴力逼供和脅迫。過去擔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的危拱之（葉劍英的前妻），儘管有參與「長征」、出生入死的紀錄，卻被彭真認為是特務，⁵⁴因此絕望至極，憤而自殺。危氏的生命最後雖被搶救回來，但從此精神失常、行為怪異。曾代理河南省委書記的張維楨、同樣來自河南黨的邵文杰和郭以清，也都遭到批鬥和迫害。

彭真除了在坦白大會上公然逼人「坦白」、親自點名「搶救」，他還根據「失足者」的供詞，循線追查和逮捕其他的「失足者」。湖北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倒大楣」。魏澤同在校方逼供下「亂咬」，彭真不但不問其供詞的真假，反而以之為根據查辦。魏氏指控孫德樞（原名沈德樞）是「反革命」，彭真就在半夜親自審問孫氏，更要之勸說同是湖北黨的徐遠和余杰放棄抵抗。徐、余都不願依從、提供不實口供，彭真便將兩人押送牢獄。⁵⁵因為魏澤同瞎說而「中箭」者，還有楊第甫。兩人過去從無共事經歷，魏氏「咬出」楊氏的原因，竟只是前者在被「搶救」時，目睹後者悠閒散步而心生妒意。⁵⁶魏氏如此草率的檢舉，從支部領導到一部主任古大存、再到彭真的校一級領導，皆無置疑，反而成為追鬥楊氏的憑據。

彭真為首的校部在大會動員「坦白」和「搶救」後，也直接引導、插

⁵² 沈漓，〈回憶父親與父親的回憶——一個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經歷（三）〉，《文學城博客》，(<http://messsdia.chinagate.com/myblog/14602/200701/7429.html>)，2016年3月2日檢閱。

⁵³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89。

⁵⁴ 袁學之，《難忘的回憶》，頁114。

⁵⁵ 沈漓，〈回憶父親與父親的回憶——一個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經歷（三）〉，《文學城博客》。

⁵⁶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96。

手黨校基層支部的「搶救」攻勢。一、校部認為具有政治問題者，「就派人暗中監視，觀其神色」，然後將蒐集的「失足者」情資和線索告知其所屬的支部，「作為批鬥的依據」。⁵⁷二、利用獎勵手段和評比方式，對黨校幹部製造壓力，讓之奮勇爭先「搶救」。校領導對於「搶救『特務』有功」的支部予以表揚，甚至贈送水果；相反地，沒有運動「成果」的單位，就得不到上級的獎勵。由於「上下級和同級的壓力」交相而至，「搞得人暈頭轉向，講實事求是就不很容易了」。⁵⁸

經過前述彭真的努力和策略，7月中旬「搶救」大舉發動以後幾日，黃火青代表校部宣布：「各支部形勢很好」，並且傳捷報般地指出河南、湖北、四川等「紅旗黨」「突破了」！⁵⁹事實上，在中央黨校「搶救運動」中被視作「紅旗黨」而遭到整肅的地方黨組織和代表，遠不限於這三地。在前一階段審幹已遭「逼供信」對待的湖南代表袁學之，這時還遭到毆打；陝西黨派出參加「七大」的兩位女性代表曹冠群（後來曾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和農業部副部長）和王惠民（彭毓泰，後來長期從事法院工作）也被誣指為「特務」。上海地下黨被說成是「紅旗黨」，其「七大」黨代表都受到審查；浙江黨也難以倖免。閩粵贛邊區黨組織亦被懷疑有問題，作為其一員的伍洪祥表示：「因搞『搶救』運動造成一陣恐怖氣氛。應該說這和校部的領導有關係。」⁶⁰中央黨校「搶救」、抓「特務」不分國籍，來自朝鮮的「革命同志」也遭殃；運動甚至曾激化至召開公審大會，判決一名護士長死刑的地步。⁶¹

中央黨校「搶救失足者」風暴平地捲起半個月後，7月31日，彭真在校內的群眾大會上宣稱：延安地區「搶救了1,600人，在中央黨校共有190人」。⁶²亦即其佔了總數近1/8的比例。在「搶救」高峰基本結束後的8月8

⁵⁷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頁90。

⁵⁸ 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410-411。

⁵⁹ 袁學之，《難忘的回憶》，頁109-110。

⁶⁰ 伍洪祥，〈經歷「搶救運動」與出席黨的七大〉，《福建黨史月刊》，第10期（福州，1999.10），頁6。

⁶¹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下冊，頁515。

⁶² 中共中央黨校教育史研究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38。

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提到：「一個 2,500 人的黨校已挖出 250 個特務」。⁶³易言之，中央黨校內有高達 10% 比例的學員遭指控為「特務」。這可看作經過中共中央認證的彭真在黨校的「搶救」「戰果」。

(二) 參與「搶救」柯慶施

彭真在中央黨校內如火如荼地推行「搶救」的同時，兼任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職位的他，也與聞延安其他機關的「搶救」，尤其是中央直屬機關的「搶救」大戲——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案。

彭真和柯慶施早期的工作關係雖然不長，但有些不順和隔閡。彭真在 1935 年 8 月出獄時，北方局的領導人是書記高文華和組織部長柯慶施。高、柯在北方局工作和政策的領導上，較為封閉、躁進和有失策略；他們對於提出異議者如李鐵夫(朝鮮人)和張秀岩(其姪女張潔清後來成為彭真的妻子)，加以排斥和批判，將之申斥為「鐵夫路線」。彭真出牢後一時生活困難，主要受到李鐵夫、張秀岩夫妻的接濟。彭真對李、張的政治遭遇自是明瞭和同情。在柯慶施的安排下，本來長於工人運動的彭真，卻被調去推行農民運動，不免讓人覺得有排擠之意。

劉少奇在 1936 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北方局後，與高文華、柯慶施在工作方針上有所歧異和爭執；彭真在政策主張與劉少奇較為相近。1936 年夏，彭真取代柯慶施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劉少奇、彭真爾後積極為「鐵夫路線」平反，並對高文華、柯慶施此前在北方局的工作進行檢討和否定。⁶⁴

延安「搶救」高潮時，柯慶施在中直機關內成為被「搶救」的重點目標，其來勢凶猛，柯新婚不久的妻子曾淡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迫於壓力而自殺。柯慶施被當作「特務」對待的一個重要線索，乃因中央黨校舉行的一次「坦白」大會上，陳傳綱(中共建政後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在逼供高壓下自承是「特務」，也招供柯慶施是「特務」。⁶⁵

⁶³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 128。

⁶⁴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7 月。

⁶⁵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 191。

關於彭真涉入、參與批鬥柯慶施的情形，根據高文華的說法，柯慶施本人即認為其在「搶救」中遭難，就是因為出自劉少奇、彭真對之的陷害。⁶⁶郭曉棠後來表示：彭真在中央黨校內對之審問時，也曾示意他去揭發柯慶施。⁶⁷「文革」批判材料也指出：彭真指使曾經遭柯慶施打擊的張秀岩出面揭發柯氏。⁶⁸

在批鬥柯慶施的大會上，根據楊尚昆的說法：乃是「和柯慶施一起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來揭他」。柯慶施在會上被過去同事質疑的重點集中在：他長年從事地下工作，何以未曾被敵人逮捕？他在北平憑何招搖過市？是否在政治上別有依靠？⁶⁹在中共的政治鬥爭中，同僚的共事經驗和近身觀察，在揭發、清算時往往能給人所言不虛的觀感和發揮擊中要害的作用。彭真有無直接參加對柯慶施「面對面」的批鬥？還留待日後有關資料的面世才能說明。

如果前述各項說法和資料屬實，驅使彭真藉整風之機積極參與批鬥柯慶施的原因又為何呢？彭真藉此一報 1930 年代中期在北方局遭柯氏排擠之仇，並且以資證明自身當時與後者政策有別的正當性？抑或還有配合中央上層整風、鬥爭王明的政治考量？柯慶施與王明早已認識，1939 年起，他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作為王明的副手。王明就認為：批鬥柯氏即是意圖從外圍進而向王明本人進攻。⁷⁰

柯慶施遭逢的「搶救」劫難，後來除了因為有周恩來為其清白作證，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金口開恩，方能使之虎口餘生。柯慶施自此對毛肝腦塗地、至死不渝。鬥柯的主要鋒將彭真也無因此事而受到任何的懲處。

⁶⁶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1967)，頁8。

⁶⁷ 郭曉棠，〈郭曉棠遺作選：文革交代材料(五)——1941-1950年我在根據地的情況〉，《至人無為博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9bd930100pf3i.html)，2016年3月16日檢閱。

⁶⁸ 徹底摧毀舊北京市委戰鬥兵團，《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狼狽為奸一百四十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罪行錄之一》(北京：1967)。

⁶⁹ 柯六六，〈延安審幹運動中的柯慶施——來自親歷者的回憶〉，《江淮文史》第2期(合肥，2012.04)，頁79-81。

⁷⁰ 王明，《王明回憶錄》(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頁170。

五、「搶救」的停而不休 (1943年夏以後)

(一) 黨校「搶救」煞車

「搶救」號角聲吹響後，彭真在中央黨校內不但對「失足者」的「坦白」內容置信不疑，更親手參與製造「冤假錯」案，同意交叉使用公眾壓力和私刑暴力，意圖讓其以為的嫌疑者屈服，坐實「紅旗黨」蔓延、散佈的預想。但彭真可能因為如後原因，覺得事態有異，須得煞車、調整。

首先、彭真在「搶救」中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坦白」資料，愈覺其中含有誇大不實的情節和離譜失真的內容。⁷¹其次、隨著中央黨校內愈演愈烈的「搶救」態勢——胡亂指控，特務帽子漫天飛，「被搶救者」如上海黨的王明遠，就曾寫字條給彭真反映問題。⁷²彭真也聽到校內幹部的異議之聲。例如：一部的支部幹部閻紅彥，對於運動的發展感到焦心，屢次向彭真、黃火青表示：「要吸取蘇聯的教訓，整風不能這個搞法。」⁷³再者，在彭真的身體力行下，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衝刺半個月後，已造成一種全校參與、殺聲震天的運動勢頭；如果不稍加以引導、降溫，也會直接影響黨校的正常運作和教育工作。此外，「搶救」高峰搶收下的「失足者」，也累積了一定的數量，需要花一些時間「消化」。

根據彭真和其官方著作提供的說法是：大約在 1943 年 7 月底，也就是「搶救」發起後的十餘天，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看到包括中央黨校在內的「搶救運動」，出現嚴重氾濫的情形，便向毛澤東反映相關問題，從而引起後者的注意，認為運動已「擴大化」，必須加以糾正。⁷⁴在此背景下，中央黨校轟轟烈烈的「搶救運動」也就此結束。

怎麼處理在「搶救」階段淪為萬夫所指、名譽掃地的「失足者」，彭真

⁷¹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頁136。

⁷² 王明遠，〈參加七大的前前後後〉，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159。

⁷³ 李原，〈只為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0。

⁷⁴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85。

表示：「現在情況和緩了，我們給有問題的同志一個時間想一想，我們也調查研究一下，一個一個地研究，個別地調查，能爭取一個就爭取一個。中央臨時授權可以捆人。其實我們不是沒有辦法，我們不用武的用文的。」⁷⁵然而，彭真接下來對所謂「有問題的同志」，是否真的「不用武的用文的」？他所說的「中央臨時授權可以捆人」，對抵死不願順沿指定口徑作「坦白」的人而言，實是一個不祥之兆。

(二)黨校一部的臨時支部

中央黨校「搶救運動」告停後，黨校將前一階段放棄「頑抗」、較為願意「坦白」(例如孫德樞)或是「案情」較輕(如楊第甫)的「失足者」100餘人，移送至二部，分屬兩個支部。另外，黨校一部各支部重新作過一次調整，將「問題較多、一時搞不清楚」者和「死不坦白」的「花崗岩腦袋」集中起來，另外成立一個臨時支部。

臨時支部成立的具體時間，約在1943年9月。臨時支部的地點在中央黨校一部的後山，與外界隔開，僅有一條道路外出；高牆圍繞、門禁森嚴，有荷槍實彈的衛兵站崗巡邏。編入臨時支部的人數約70多人，其中有20多名是來自各地的黨代表。⁷⁶如前所述，關於「一部的工作」，彭真乃與黃火青、古大存「親自抓」，一部調整後新成立的臨時支部，彭真不可能被蒙在鼓裡。另外，針對臨時支部有多位黨代表被當作特務審訊的異常情況，臨時支部內的被審訊者，也曾寫信給彭真反映此事並提出異議，卻無得到任何回音。⁷⁷

彭真為首的校部擇定聶洪鈞擔任臨時支部書記。聶洪鈞在1942年西北局檢查歷史問題時，被視作犯有肅反濫殺錯誤的人士，並因此被責令檢討。聶洪鈞在1942年到中央黨校學習，後來在一部擔任幹部，參與了1943年

⁷⁵ 中共中央黨校教育史研究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頁40。

⁷⁶ 袁學之，《難忘的回憶》，頁110。趙石，〈難忘的延安歲月——紀念七大六十周年〉，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234。

⁷⁷ 趙石，〈難忘的延安歲月——紀念七大六十周年〉，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235。

的黨校審幹。彭真「點將」聶洪鈞出任臨時支部書記，或許有要之戴罪立功的考量。另外，聶洪鈞在 1943 年黨校審幹的過程中頗為激進，他後來就自承：「對新幹部或中間脫離過黨的老黨員，則表現某些主觀片面的懷疑，在做法上輕信了口供。」⁷⁸彭真欲聶洪鈞領導集中所謂「搶救」對象的臨時支部的工作，是不是期望後者在進行甄別工作時，不要有太大的反覆，以免全面否定「搶救」階段的運動成果？聶洪鈞後來自省在臨時支部的作為：「我的主觀片面思想和做法又繼續了半年多的時間，損傷了一些幹部。」⁷⁹在臨時支部受審的人員，後來回憶起聶洪鈞也甚有怨氣。

被編入臨時支部的人員雖然物質生活同黨校無甚差異，但是停止學習、無法聽取重要演講報告、不准外出、沒有行動自由。臨時支部下分七、八個小組，每一小組內部的學員雖「同是天涯淪落人」，但卻被要求互相審查和批鬥，其中有些學員為了洗刷自我、立功翻身，反而變成臨時支部書記心狠手辣的打手。各小組存在嚴重程度不一的「逼供信」，輕則「車輪戰」，重則毆打刑求，意欲屈打成招。鄒風平所待的小組就甚為暴力；郭曉棠雙手長期被繩網綁，深及皮肉。曾志（「改革開放」時期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在臨時支部的室友兼牢友，除了自殺未遂、精神崩潰的危拱之，還有過去效力於周恩來領導的特科、負責對閻錫山方面進行潛伏和情報工作的宋維靜。宋氏因為被長期單獨關押，幾乎失語，後來變成整日囁語不停。曾志也回憶到臨時支部夜晚傳揚「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⁸⁰中央黨校臨時支部的黑獄，相較於康生中央社會部管轄的邊區政府保安處的牢房，甚至還「厲害多了」。⁸¹

正當臨時支部以秘密的方式審問校領導認定的那些「堅不吐實」者，1943 年 12 月 3 日，彭真在中央黨校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審查幹部運動，是『一個革命』，把過去對黨隱瞞的問題坦白報告了黨」；「這是黨的勝利」。

⁷⁸ 聶洪鈞，《聶洪鈞回憶與文稿》（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21。

⁷⁹ 聶洪鈞，《聶洪鈞回憶與文稿》，頁21-22。

⁸⁰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下冊，頁341。

⁸¹ 丁東、李南央，《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頁165。

沒有殺一個人，也沒有毀滅一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⁸²彭真高唱「沒有殺一個人，也沒有毀滅一個人」時，是對危拱之被鬥得精神失常視而不見嗎？更諷刺的是，鄒風平在臨時支部內持續承受巨大的逼供壓力，要之違背心意承認自己是「特務」。鄒氏不願為解一己之危，導致其上下關係人背負「特務」之名，讓四川黨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在彭真此次講話後相隔不久，鄒氏乾脆自殺以明志。

鄒風平死前遺留的字句是：「冤死慈親手，淚眼望飛雪；委屈並無怨，忍痛護高節。」張宣後來就質疑：「黨中央不是在 1943 年 8 月就決定停止搶救了嗎？況且中央黨校與中央辦公廳雞犬相聞，辦公廳一個電話也可以打過來，為什麼到年底還在逼死人呢？」張宣更直指：「中央黨校領導人反對的不僅是鄒風平，而且是黨中央！」⁸³事實上，彭真的中央黨校不只是鄒風平步上自殺一途。黨校第一部在審幹、「搶救」過程中即有 4 至 5 人自殺。⁸⁴難不成就彭真的理解，自殺者不是被毀滅的，而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死不足惜？

1943 年秋後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尤其是在臨時支部繼續充斥暴力和不人道的情況，彭真理應瞭若指掌，卻顯得若無其事，令人感到詫異。

六、參與第二次高層整風 (1943年秋後)

1943 年夏秋，正當彭真領導中央黨校經受「搶救」的高峰，中共的高層整風也進入白熱化階段。彭真一方面領導中央黨校的運動，從下而上地對「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發動側翼進攻；另一方面，他也參與上層的揭發和批鬥。相較於 1941 年秋高層整風中的有限度參與，彭真在這階段的高層整風中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幫手之一。

⁸²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243-244。

⁸³ 張宣，〈鳳凰驚夢——延安「搶救運動」親歷記〉，《紅岩春秋》，頁24。

⁸⁴ 蕭一平，《延安整風運動：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26。

(一)從黨校發起助攻

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指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只有罪惡而無功勞，危害也最大」；「要揭破教條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對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毛最後再稍加提醒：「我們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⁸⁵彭真聞後在黨校備齊「壯馬強兵」，待命向「教條宗派」「將軍」。

中央黨校的「搶救」浪潮過後，按毛澤東的指揮和佈署，1943年入秋後，彭真就將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轉向學習討論黨的歷史和路線問題。彭真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根據其時任秘書的回憶：彭真「利用黨校各種集會來講路線鬥爭的大課，列舉了我黨歷史上的右傾錯誤和三次『左』傾錯誤，以大量事實和典型事例證明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有很大的說服力和鼓動性。」⁸⁶彭真在這方面如此賣力，除了是盡心執行中央黨校負責鑄造幹部政治認同——信從毛澤東個人及其各方面的領導——的任務，也有配合當下中央高層整風政治清算的目的。

1943年9月、11月，中共中央召開延續多日的政治局會議，加大上層整風的力道。相關會議有時擴大出席人員的範圍，安排中央黨校的幹部成員和一部高幹學員(旅、地級以上，其中不少是「七大」代表)與會，作為上層整風大會的「群眾」。彭真在中央黨校內致力灌輸的思想教育——毛澤東作為「正確路線」的唯一代表、與之對立者則盡屬不同傾向的「錯誤」，此時發揮功效。

1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楊家嶺連日召開大會，公開批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經過彭真用心「教導」和「啟發」的黨校要員如黃火青和多位高階學員，在會上踴躍發言，尖銳地批判王明，甚至提出要開除王明的中央任職和黨籍；他們在「教條主義」相關人士上台發言時，實行干擾戰術，不斷發問、質疑，使之無法順利講話。王明的妻子孟慶樹甚至

⁸⁵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下卷，頁702-703。

⁸⁶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中共黨史資料》，第2期(北京，2008.02)，頁63。

因此情緒失控，招致會上聽眾的另一波責罵。⁸⁷

會上還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李國華登台報告王明旅蘇期間的情形，亦即以其親身經歷對王明作近身的揭發。⁸⁸1942年下半年李國華在中央黨校內被當作「教條主義」典型而慘遭批鬥，與吳奚如同是黨校審幹的第一批「標靶」；李國華之後在校內遭到監視、行動受限，這時卻可公然露臉揭發王明，沒有得到彭真等校領導的首肯，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猜想，李氏在大會公然揭發王明，乃是彭真從外圍砲打王明的一個巧心安排。

1943年秋，彭真督率的中央黨校「人馬」，熱烈、亢進地參與旨在批鬥「教條主義宗派」的楊家嶺大會，乃為毛澤東批鬥王明提供、製造了「革命群眾」齊聚聲討的聲勢，如此顯示毛澤東討伐王明及其代表的政治路線，並非僅是高層的個人意氣之爭或是權力之鬥，而是反映黨內上、中層的一種普遍性的「民意」和「共識」；與此同時，彭真在中央黨校內攪起對王明等人的「階級義憤」，也是對後者示警：「教條宗派」勢單力孤，在黨校「群眾」中已毫無政治市場，除伏首投降外，別無他途。

(二)參與批判博古

1943年秋，中共中央高層批鬥「教條主義」具體人士時，彭真對博古的猛烈攻擊，頗值得一說。王明後來指控：毛澤東曾派彭真、李富春、高崗和林彪，前去找博古，要後者必須按照「罵自己、罵王明、罵俄國人」的基調進行「交代」。⁸⁹王明的說法沒有得到其他資料的佐證，但是根據博古自身的說詞，彭真和康生對其所提的意見，令之無法忍受。

整風以來一直處於被批判地位的博古，在回覆同僚們對其革命歷史的種種質問和指責時，多是耐心、虛心以對；但是1943年11月中央高層整風會議再起後，博古特別反感彭真、康生在會中對之革命立場的質疑和不信任，認為有辱其「個人清白」。11月13日，博古表示：「此次討論是為弄

⁸⁷ 王漁，《回憶中央黨校》，頁214。

⁸⁸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下卷，頁550。

⁸⁹ 王明，《王明回憶錄》，頁170-171。

清路線問題，求得教訓，教育全黨。平心靜氣的討論，徹底揭發錯誤，實在是必要的。但是如昨天彭真、康生等的提法，我以為是對一個共產黨員的誣衊，是不能忍受的。」⁹⁰

彭真和康生指控博古對黨不忠、與敵勾結，讓相關批鬥有走向不可收拾地步之虞，甚至有違毛澤東聲稱的「治病救人」方針。毛最後出面講話緩和情勢：「教條主義還是革命的，不過是搬教條就是了」；並指出「教條主義者」在打倒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以及主張分田給農民的問題上，與大家一致。與聞上述政治過程的楊尚昆後來回憶：「在關鍵時刻，毛主席這麼一說，有利於抑制那股『左』的情緒。」⁹¹

在毛澤東指示對「教條宗派」的批鬥要煞車後，彭真對博古等人的批鬥方有所收斂。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彭真表示：「在路線學習時，毛主席說，這是社會現象，才使我思想上有了轉機，並逐漸認識到博古同志他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⁹²

(三)參與批判周恩來

當中共中央高層整風劍指「經驗主義宗派」時，彭真也甚是積極。「經驗主義宗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長年擔任中央領導職務的周恩來。中共官方編寫的周恩來年譜表示：「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周恩來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過火的指責與批評。」⁹³誰對周恩來施加「不公正的和過火的指責與批評」？其中就包括彭真。

彭真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表示：在延安整風後期，「毛主席強調團結，我的認識還或多或少地停留在運動的前一階段，因而從團結出發的精神很不夠」，並曾對幾位同志的「態度很不好」。⁹⁴彭真「態度很不好」

⁹⁰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頁182。

⁹¹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12。

⁹²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277。

⁹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81。

⁹⁴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84。

的針對對象，除了前述的博古，還有周恩來。⁹⁵彭真對周恩來的整風批判內容可能有：一、周恩來偕同王明在抗戰初期主持長江局的政治「錯誤」；相關問題乃是周恩來在延安高層整風中大遭責難的事由。彭真在高層整風會議上，就直接點名批判周恩來、王明兩人在長江局的政治主張和作為，特別是批評他們在國共關係互動中缺乏獨立自主性(認為一切要經過統一戰線)、對形勢判斷嚴重有誤等。⁹⁶

二、周恩來當下對國民政府統治區(國統區)地下工作的領導問題。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範圍遍及四川、湖北、湖南、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江蘇等所謂「大後方」，甚至還包括港澳和海外地區。如果說康生在延安整風中大抓「紅旗黨」，使得負責領導其中多數地下黨組織的周恩來「處境也相當困難」，進而被迫出面澄清「沒這回事」。⁹⁷在「搶救」「紅旗黨」的同一問題上，彭真主導下的中央黨校整風審幹，與康生在其他單位和部門所為相較，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因為在黨校學習的相關「涉案」幹部，其中還不少是當地的領導幹部，亦即「嫌疑人」更為高階、其「案情」更為重大。例如：被強逼認罪的魏澤同，以及繼續押送臨時支部審訊的鄒風平和袁學之。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彭真令周恩來政治「處境」「困難」？⁹⁸進一步地說，「紅旗黨」問題有無可能作為彭真在參與中央高層整風時，向周恩來提出質疑的話題？就算沒有，彭真監管的中央黨校在此一問題上，也確實讓周恩來嘗到苦楚的滋味。

1943年7月下旬，周恩來自重慶回到延安後，對於正在大張旗鼓進行的整風審幹甚表關切，因為延安(包括彭真管控的中央黨校)認為有「問題」、並加以關押的幹部中，有不少屬於周恩來管轄的人員，他努力為之撰寫證明。周恩來也曾專門向彭真了解黨校整風情況。⁹⁹周恩來對此的關心，事實

⁹⁵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頁138。

⁹⁶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3年8月。

⁹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2冊，頁683。

⁹⁸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上冊，頁130。

⁹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頁572、580。

上也有一個保護自己、避免被人指責識人不明、用人不周的政治考慮。然而，周恩來為所謂「失足」嫌疑人所作的證詞，有時在中央黨校會受到刁難，未必獲得採信。¹⁰⁰四川黨被彭真為首的校領導視作「紅旗黨」批鬥，周恩來因為自顧不暇而不便出手相救其「首犯」鄒風平。¹⁰¹鄒氏最後屈死於黨校，就引發周恩來的震驚和憤怒。¹⁰²

彭真指揮下的中央黨校審幹反奸，更直接進逼、懷疑周恩來的左右手，周本人應也感到難受。鄧穎超隨其夫周恩來回到延安，先是協助周整理其轄區的審幹資料，之後和同是南方局的錢瑛被安排至中央黨校學習。針對國統區的地下黨工作問題，鄧、錢在黨校內發言也受到批判，甚至「氣得哭」。¹⁰³南方局組織部長孔原，後來也表示：「1943年我和錢瑛同志差不多同一時候回延安，在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我們都被誣衊為叛徒特務，『紅旗黨』，受到審查，受大會批判。」¹⁰⁴由此可見，周恩來在國統區的幹部和地下工作，在彭真領導的黨校內是被另眼看待、頗受猜疑的。

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政治處境甚為艱難，甚至引起蘇聯方面的關注。1943年12月22日，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致電毛澤東，主張將周恩來和王明留在黨內。¹⁰⁵也就是表露出對周、王二人恐被革除黨籍的憂心。這可能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蘇聯方面的資料指出：康生曾言延安存在一個「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成員包括王明、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新四軍的失敗與「國特」大批滲入黨內，他們難辭其咎，中央也將對此進行討論和處理。¹⁰⁶

周恩來最後能自延安整風的政治圍剿脫身，主要還是毛澤東。他眼見

¹⁰⁰ 廖志高，〈返回延安參加七大〉，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300。

¹⁰¹ 傅平，〈審幹運動和周恩來〉，《紅岩春秋》第4期(重慶，2000.04)，頁30。

¹⁰² 金鳳，《鄧穎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上冊，頁351-352。

¹⁰³ 沈漓，〈回憶父親與父親的回憶——一個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經歷(三)〉，《文學城博客》。

¹⁰⁴ 孔原，〈一位傑出的革命女性——憶戰友錢瑛同志〉，收入帥孟奇主編，《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21。

¹⁰⁵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133。

¹⁰⁶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128。

批周的火勢已燒得過頭、甚至有將之吞噬的可能，才加以叫停(有資料指稱：彭真後來在審查「七大」代表資格時，也曾刁難周恩來，對其黨齡提出疑問；最後也由毛指示擱置討論)。¹⁰⁷周恩來歷經延安整風的批鬥後，元氣大傷，徹底臣服在毛的領導之下。

(四)參與批判彭德懷

彭真在延安高層整風中，也積極參與批判另一位重要「經驗主義」人物彭德懷。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毛澤東示意下召開華北地方與軍隊同志座談會，也就是通稱的「華北工作座談會」；此會最後演變成對彭德懷的集中批鬥。華北工作座談會就在彭真主管的中央黨校內舉行，彭真也出席與會。彭真批鬥彭德懷的發言內容，至今沒有公開。但從薄一波相關回憶所透露的資訊，可猜知彭真至少有針對彭德懷的「鬧獨立性」發表批評意見。¹⁰⁸所謂「鬧獨立性」，主要就是批評彭德懷較少徵引毛澤東的話語、較少對之公開表示頌揚；相對地，表現出自以為是、自作主張的傾向。彭真在延安整風中批判彭德懷時的過激傾向，可見於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他的自白：在整風後期檢討華北工作時，「對當時北方局個別負責同志的批評，也有不妥或過火的地方」。¹⁰⁹

彭真在延安整風期間，亦曾對彭德懷早年領導的平江暴動士兵委員會成員進行審查。彭真主持相關審查的目的是組織審幹的例行公事，或者是對彭德懷起家歷史的一種帶有不信任的調查？目前沒有資料可以說明。但彭真在此事上也似有過當之處，以至於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真要對彭德懷進行批鬥之前，還得先為此作自我批評、表示歉意。¹¹⁰

以檢討彭德懷工作、以至其個人作風為主要內容的華北工作座談會，在薄一波、彭真等人開火下，會場砲聲隆隆、氣氛緊張。薄一波後來憶此

¹⁰⁷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頁366。

¹⁰⁸ 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184。

¹⁰⁹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84。

¹¹⁰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89。

表示：「批評的激烈性至今猶記」。¹¹¹作為批判標靶的彭德懷備感壓力、心生怨懟。事隔多年後的 1959 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此事還憤憤不平，進而釀就黨內的一場大鬥爭。

七、運動收場和政治攀升

(一)黨校甄別工作的開展

時至 1944 年以後，在中共高層整風方面，毛澤東設定的整風主要對象如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已心悅誠服，王明雖未必此想，但也無力反擊；此前又有蘇共的來電關切以及現實工作繼續推行的需要，因此步入一個較為緩和的階段。以中央黨校為重點的整風審幹運動，也相應進入甄別的階段。

1943 年 12 月 22 日，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基於多方面的意見和資料，提出應要對「搶救運動」抓挖出的「特務」進行甄別。任氏的提議為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所採納。值得注意的是，任弼時在中央會議上陳述意見時，特別提到中央黨校一部的審幹工作本來尚好，但後來卻無保持下去。¹¹²在此背景下，彭真開始在中央黨校推行甄別工作，具體情形如下：

中央黨校的「搶救」高峰告歇後，彭真鑑於一部「搶救」的激況，便沒有在二部推行「搶救」運動。二部另外接收了「搶救」階段中一部較願「配合」或「案情較輕」者 100 餘人如楊第甫、孫德樞。二部負責人張鼎丞、特別是安子文以公允、細心的態度和穩妥、細緻的方式，對這一特殊群體進行甄別、審理的工作，終而使得其中絕大多數的「坦白者」獲得解脫。¹¹³

針對黨校一部的臨時支部，彭真首先將聶洪鈞調離，由范式人接任書記。范氏態度也頗為死板、僵硬，但因為要求甄別平反的呼聲愈來愈大，臨時支部內的受審人對之也開始抗拒。其次、如彭真自己所言：「甄別工作

¹¹¹ 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頁 183。

¹¹² 中共中央黨校教育史研究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頁 73。

¹¹³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45-47。

吸收了前方及大後方負責同志參加」。¹¹⁴一方面，鄒風平身前在四川的戰友廖志高，被調到臨時支部擔任副書記，再加上越來越多的關係人和知情人協助調查和澄清作證之下，臨時支部的甄別審理工作，開始由慢轉快。例如：廖志高與熟悉南方局人事問題的錢瑛一道努力，「解決了不少同志的問題」。¹¹⁵錢瑛就當面與魏澤同對質，戳破後者在「搶救」中被逼急亂講的各項「坦白」內容。另一方面，為加強甄別工作的質量和速度，彭真讓未與聞「搶救」運動、後來才至黨校的「前方」幹部學員如薄一波、羅瑞卿等人，在一邊學習之餘，一邊協助複查「搶救」出來的「嫌疑分子」。在羅瑞卿的謹慎調查下，陝西黨的王惠民和曹冠群才「撥雲散霧見青天」。¹¹⁶

中央黨校三部的前身是打出「王實味反黨集團」、主要聚集知識分子的中央研究院。三部在「搶救運動」中也大受衝擊，成為彭真領導的中央黨校運動中，一部以外的另一個「搶救」「災區」，有不少人被硬戴上「特務」或「嫌疑分子」的政治帽子。1944年3、4月間，彭真派李兆炳去三部協助進行審幹的甄別工作。最後原先被認作是「失足者」的案子，絕大多數都被平反，僅剩零星幾位須待查清。如此可見三部先前「搶救」的荒腔走板。

(二)從管理黨校擴至掌理全黨組織工作

正當彭真在中央黨校推行甄別工作，1944年5月，毛澤東應彭真之邀到黨校演講時表示：針對黨校整風中「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¹¹⁷彭真在黨校「二把手」的職位不但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反而約此前後，他在延安的中共政壇直是「搏扶搖而直上」，獲任更多重要的職務。這無疑與毛澤東對彭真在整風運動的總體表現的肯定、欣賞是分不開的；也直截反映他對後者在中央黨校的「搶救」爭議及其造成的傷害，覺得瑕不掩瑜，

¹¹⁴ 中共中央黨校教育史研究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頁80。

¹¹⁵ 廖志高，〈返回延安參加七大〉，收入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下冊，頁1300。

¹¹⁶ 《羅瑞卿傳》編寫組著，《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頁103。

¹¹⁷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254。

亦不甚介意。

1944年3月5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原由陳雲擔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改由彭真代理；陳雲則調至西北局任職。¹¹⁸從毛澤東看來，彭真在中央黨校推行整風審幹，雖有過頭、過激的情況(彭真有可能正是不打折扣地按毛的旨意辦理)，但已在進行調整和甄別，因此並無大礙，也無須揪住不放。毛更看重的還是：彭真在黨校的「搶救」作為，有製造震懾壓力、適時配合毛從事高層整風和鬥爭的作用；彭真在黨校緊扣毛的心意所向，特別是按毛的政治標準教導、改造在黨校學習的各級學員，更為毛提供厚實的政治支持基礎。這應是毛放心地進一步將更重要的黨組織人事大權，委交給彭真的關鍵原因。

另外，彭真在中央黨校已累積形塑一套行之有效的整風方法和思想改造模式，在審幹上歷經反奸「搶救」後也形成一套較審慎的操作程序和辦法。對黨校工作積極投入的彭真，利用整風審幹的工作和過程，也認真吸收、熟悉、進而掌握黨內高、中級幹部的大量人事資訊。1943秋冬以後又有大批的各地「七大」代表陸續抵達延安，亟需整風改造和審查過濾，毛認為彭真可以勝任外，也希望借重其中央黨校運動經驗，向中共其他屬地推廣。

彭真在1944年政治上的平步青雲還表現在：5月，中共緊鑼密鼓地為召開「七大」作準備，專門成立兩個委員會：一是任弼時為首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目的在將近三年來中共高層整風中對中共發展歷史的解釋——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貫穿過去和當下，並且也將引導黨的未來，用正式的書面文字定下，最後的結果即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另一是劉少奇為首的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負責起草《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最後的內容乃以高度頌揚毛澤東而著稱。彭真皆是這兩個重要委員會的成員。此外，中共分別在6月、9月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和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都膺任負責人。其工作重點和重心，從1944年下半年已超出中央黨校，更多地轉移到中央工作和部門。

¹¹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上卷，頁381。

(三)在「七大」的政治躍升和選舉風波

彭真自 1941 年中到延安工作、參與領導整風運動(含審幹)的最大政治回報，就是贏得毛澤東的進一步寵信，並在其一手拉拔下在中共「七大」及其後躋身中央最高領導層。

在三年整風期間，彭真依毛澤東所願但又不用其完全表明態度的情況下，一方面在中央高層向所謂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無情開砲，讓後者飽受壓力、窮於對付，進而紛紛向毛乞降、求饒；另一方面，彭真在中央黨校有效、有力地向高中級幹部和地方黨代表施加毛式的整風教育。彭真在「七大」前夕自評黨校整風學習的兩大收穫是：一是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提高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二是批判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左」傾教條主義(特別是所謂的「王明路線」)。¹¹⁹有統計數字顯示：歷經彭真黨校整風學習和資格審查的「七大」代表，超過「七大」代表總體人數的半數。¹²⁰換言之，經過彭真的用心努力和費心張羅，對毛澤東的領導和思想要篤信奉行的信念，更加普遍深植於黨的上層幹部，從而為「七大」的召開提供了重要的組織條件。

1945 年 4 月至 6 月，中共舉行「七大」。毛澤東被與會者高呼萬歲、當作人神崇拜。其背後彭真注入的心力，毛澤東自是了然於胸，對彭真的激賞也表露於形。根據王明的說法：毛澤東曾宣稱彭真是「天生的毛澤東分子」；經過整風運動，毛進而稱彭真為其「親密戰友」之一。¹²¹毛澤東在政治上論功行賞，欲在「七大」拉抬彭真的地位，卻遇到了一個頗尷尬的情況，必須為之排除，而這與彭真在整風審幹過程中竭力表現、不留人情的傾向有關。

中共「七大」期間，黨代表針對中央委員選舉人選進行討論的過程中，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遭受到最多的批評和責難；彭真和康生則因他們在整風審幹運動中好戰、好鬥的角色而不受歡迎；針對審幹問題，部分

¹¹⁹ 王漁，《回憶中央黨校》，頁124。

¹²⁰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中共黨史資料》，頁57。

¹²¹ 王明，《王明回憶錄》，頁77、253。

代表更對彭真有些怨懟之言。¹²²彭真在中央高層整風中，自恃正確、態度激昂，有時得理不饒人，甚至懷疑博古政治不忠、與敵人有染，令之氣結不已；他在審幹反奸問題上，對過去的組織和人事工作未予尊重，反持以敵情嚴重、內奸重重的估計，並且在中央黨校採行大肆鋪網、亂鬥亂抓的做法，黨內高幹如任弼時、周恩來、陳雲、張聞天或多或少就心有保留和反感。

彭真指揮下的中央黨校審幹工作，對校內人員製造必須證明自身政治清白的高度壓力；「搶救運動」以及其後的臨時支部集體錯案和如鄒風平被逼自縊等個別冤案上，彭真台前幕後的主導角色和爭議作用，在整風運動的尾聲，人們也非全然不知和坦然釋懷。再加上，彭真在推行甄別工作時，或出於高度的責任心，有時錙銖必較、拘泥瑣碎，讓當事人苦惱不已，若一時找不到解決之法，在審查結論中還會留下存疑字句，令人感到心有疙瘩、不甚暢快；¹²³而且冗長的審查甄別，也會影響到受審人的工作分配問題，耽誤其報效革命的時機。

毛澤東耳聞「七大」代表針對彭真的不滿聲浪後，決心出手相挺、為之緩頰。在毛澤東的介入下，彭真方能在大會的中央委員選舉中，獲得相對較高的得票，在 44 名中央委員中排序 18。¹²⁴如果沒有毛澤東護航，彭真能否排在「經驗主義者」周恩來(排名 23)、「教條主義者」張聞天(排名 26)之前，恐怕還很難說。彭真也自知在「七大」代表中存有一股對之的不滿之氣。「文革」前，彭真談及「七大」中委選舉其得票不多的問題時，就表示乃因他在延安整風中「得罪了一些人」。¹²⁵

彭真在中共「七大」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繼而選進中央政治局，在 13

¹²²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385, 469-470.

¹²³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頁284。

¹²⁴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354.

¹²⁵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和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2011年5月1日檢閱。

位政治局委員中，排行第9。「七大」結束後情勢急遽變化，日本宣告投降，繼而國共擬議召開會談。在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共前赴重慶參加國共和談之前，為了以防不測，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外，另外補選兩位候補書記：一是政治局排名第6位的陳雲，另一則是彭真，直接越過了政治局排名在他之前分屬第7、第8名的康生和高崗。根據訪談所得，在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排序中，彭真甚至還在陳雲之前。¹²⁶彭真自此成為中共第一代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領導集體」的一員。鑑於彭真在延安整風中與自身如臂使指般的默契配合，以及其立下的汗馬功勞，這才是毛澤東內心真正想要為彭真安插的黨內地位和排序。

八、結論

毛澤東在延安推行整風運動時，彭真位居要津、連結上下，既參與了高層領導人的整風，也直接負責領導群聚高中級幹部和各地黨代表的中央黨校的整風審幹，立有重大功勞。中央高層整風大批錯誤路線、撻伐兩個宗派以樹立毛澤東的無上權威的過程中，彭真獻智獻力、勇猛殺陣，其發揮的壓制作用不下劉少奇、康生；在中央黨校的整風中，彭真又培植、篩選出大批死忠於毛的上層幹部和黨大會代表，讓毛在黨內菁英圈的權力地位有更深厚、穩固的群眾基礎。相較此一重要的成績，彭真在運動的審幹反奸階段雖一時激越行事、傷及無辜，似也無傷大局、可以忍受；何況彭真還算是識途知返，不像康生對「搶救」繼續執迷、無意收手，也沒有像王震意圖簡單使用刀槍了事，¹²⁷從而避免產生更大的混亂和死傷。

總的來看，相對於劉少奇有功於廓清高層的路線之爭、康生有助於運用祕密警察、製造緊張以驅動運動前進，以及高崗有益於在西北邊區貫徹運動政策，彭真同時參與高層和菁英(中央黨校為集中地)整風，使之大致按部就班地發展，縱有脫序也在可控的範圍之內。亦即在毛澤東的延安整風

¹²⁶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年7月。

¹²⁷ 《王震傳》編寫組，《王震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上卷，頁193。

工程中，彭真佔有舉足輕重的一席之地；毛也在整風期間和其後，不次破格拔擢彭真，讓之成為毛自身和劉少奇以外整風的最大政治贏家(高崗雖同彭真一樣首次升任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但畢竟沒像彭真還被補選高升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彭真在延安整風審幹運動中不計毀譽地完全聽令於毛澤東，縱使為此與人結怨也不在乎。驅策彭真的政治動因可能有：他對毛個人及其領導的折服、對毛整風審幹構想的認同、對毛在與其素無淵源的情況下委以督導運動重任的感謝，或也不能全然排除他有為求個人政治升遷的謀算…等。無論彭真內心的真實所想為何，他的政治命運自此與毛緊密聯繫，並長時得勢。但彭真一旦失去毛的好感和庇護，他在延安運動過程中與人結下的政治夙怨，就伺機發酵，對之報復。

延安整風運動結束之後僅約四年之譜，中共即以摧枯拉朽之勢顛覆國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整風運動及其成效被視作中共取得全面勝利的重要因素。中共建政後，毛澤東也不時在現實政治中參照、沿用延安整風的運動模式和手法。彭真以參與領導延安整風為榮，也繼續甘為毛澤東整風政策的馬前卒。

毛澤東在 1957 年套用、仿效延安整風經驗，在全國推行整風運動，最後運動變奏發生傷人無數的「反右派」鬥爭，彭真全程致力協助。¹²⁸當毛澤東為了推行「大躍進」運動而在高層進行整風為名的政治批鬥時，彭真重操延安舊業，按毛的政治好惡劃線待人和無限上綱，並將他曾針對延安高層整風激烈言行所表示的歉意(如前所述集中表現在 1954 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拋諸腦後。1958 年初，毛澤東因「反冒進」問題重批周恩來的「經驗主義」錯誤，彭真從旁助陣；¹²⁹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毛認為彭德懷挑戰其所倡的「三面紅旗」，決定對後者「新賬老賬一起算」，當年在延安參與批整彭德懷的彭真自是不二人選，他在批判時也確實信手拈來、毫不費力。¹³⁰

¹²⁸ 鍾延麟，〈彭真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6卷第2期(臺北，2014.06)，頁247-292。

¹²⁹ 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頁180。

¹³⁰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97、199、206-208、315。

針對延安整風審幹中的過激現象和造成的傷害，「文革」前彭真在工作或私底下皆有表示道歉。持平而論，他對延安運動的爭議環節，也並非完全沒有回首借鑑。1950年代初期北京市審查幹部、清理「中層」(清理政府機關、企業事業內部的敵人、特務和「反革命」)，彭真強調吸取延安整風教訓，不採取「面對面」的揭發鬥爭；¹³¹在對付資本家的「五反」運動中，他批評並制止「逼供信」行徑；1965年彭真負責轉變「四清」先前濫打亂鬥基層幹部的政策，薄一波稱彭真是「接受了延安整風的經驗」。¹³²然而，這種有意識汲取延安運動教訓、以免再蹈覆轍的情形，在彭真「文革」前的整體政治表現和傾向中，位屬支流、局部，其不甚連貫、時有時無，而且是事發後的見錯補過多於事發前的防患未然。最後，彭真恐始料未及的是，他自己在1966年淪作毛澤東發動的前所未有的巨型整風——「文革」的首批「搶救」對象。

「文革」中經歷批鬥羞辱、坐牢虐待和外地流放各種劫難的彭真，在1979年終而重返中共政壇。延安整風審幹的歷史，對於彭真的政治仕途仍然揮之不去、造成影響。根據訪談資料，陳雲在「改革開放」時期極力反對彭真進入中共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會，他向黨中央列舉彭真不適任的理由中，既有1940年代前半期彭真在延安整風審幹中的「左」，¹³³也有1940年代中期他在領導中共中央東北局期間的「錯」。¹³⁴

彭真雖然與中共中央常委一職失之交臂，但是他依然發揮重要的政治能量。彭真在鄧小平主政時期受命主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其用心加強全國人大的制度，也盡力推進國家法制的建設；另外，他也在中央分管政法工作，整頓社會治安。彭真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退出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1988年也卸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但是仍有不可

¹³¹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北京，2012.10)，頁69。

¹³² 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古田兵團、冶金部機關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聯合戰鬥團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罪刑錄》(北京：1967)，頁26。

¹³³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年8月。

¹³⁴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期(臺北，2016.03)，頁133。

小覷的「政治餘熱」。1989 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也注意向之探訪和請益。彭真晚年在領導全國人大、法制和政法工作時，有否汲取延安整風審幹的經驗和教訓？他年老回顧和總結自身的從政過往時，又如何看待、處理延安相關運動的歷史？囿於文章篇幅，將來另作討論。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檔案史料

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古田兵團、冶金部機關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聯合戰鬥團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罪刑錄》，北京，1967。

Zhong gong zhong yang gong jiao zheng zhi bu gu tian bing tuan, Ye jin bu ji guan han wei Mao zhu xi ge ming lu xian lian he zhan dou tuan, bian,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fen zi Bao Yibo zui xing lu*, Beijing, 196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bian,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jian xuan ji*, di 14 ce, Beiji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chu ban she, 1992.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1967。

Yuan Beijing shi wei ji guan Mao Zedong si xiang hong qi bing tuan, *Da ye xin jia, da yin mou jia Peng Zhen zui e shi (1925-1966)*, Beijing, 1967.

徹底摧毀舊北京市委戰鬥兵團，《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狼狽為奸一百四十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罪行錄之一》，北京，1967。

Che di cui hui jiu Beijing shi wei zhan dou bing tuan, Liu Shaoqi, *Deng Xiaoping, Peng Zhen lang bei wei jian yi bai si shi li: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fen zi Peng Zhen zui hang lu zhi yi*, Beijing, 1967.

(二)回憶史料

丁東、李南央，《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

Ding, Dong, Li, Nanyang, *Li Rui kou shu wang shi*, Xianggang: Da shan wen hua chu ban she, 201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七大代表憶七大》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shi yan jiu shi di yi yan jiu bu, bian, *Qi da dai biao yi qi yi da*, shang, xia ce,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孔原，〈一位傑出的革命女性——憶戰友錢瑛同志〉，收入帥孟奇主編，《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19-22。

Kong, Yuan. "Yi wei jie chu de ge ming nu xing: Yi zhan you Qian Ying tong zhi," shou ru, Shuai, Mengqi, zhu bian. *Yi Qian Ying*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1986), 19-22.

王宇光，〈我對南方局正確領導的切身體會〉，《紅岩春秋》，第6期（重慶，2006.06），頁6-7。

Wang, Yuguang. "Wo dui nan fang ju zheng que ling dao de qie shen ti hui," *Hong yan chun qiu*, di 6 qi (Zhongqing, 2006.06), 6-7.

王明，《王明回憶錄》，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

Wang, Ming. *Wang Ming hui yi lu*, Xianggang: Ha ye chu ban she, 2009.

王漁，《回憶中央黨校》，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

Wang, Yu. *Hui yi zhong yang dang xiao*, Beiji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chu ban she, 2013.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北京，2012.10），頁68-73。

Wang, Hanbin, kou shu, Han, Qinying, fang wen. "Zai Peng Zhen shen bian gong zuo er shi wu nian de pian duan hui yi," *Zhong gong dang shi yan jiu*, di 10 qi (Beijing, 2012.10), 68-73.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

Sima, Lu. *Zhong gong li shi de jian zheng: Sima Lu hui yi lu*, New York: Ming jing chu ban she, 2004.

伍洪祥，〈經歷「搶救運動」與出席黨的七大〉，《福建黨史月刊》，第10期（福州，1999.10），頁5-8。

Wu, Hongxiang. "Jing li 'qiang jiu yun dong' yu chu xi dang de qi da," *Fujian dang shi yue kan*, di 10 qi (Fuzhou, 1999.10), 5-8.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He, Fang. *Cong Yanan yi lu zou lai de fan si: He Fang zi shu*, shang ce, Xianggang: Ming bao chu ban she, 2007.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和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2011年5月1日檢閱。

Li, Haiwen, Wang, Yanling. "Mi shu Zhang Daoyi tan Peng Zhen he Mao Zedong 1963 nian hou de guan xi," *Ren min wang*,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

2011/5/1 jian yue.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Li, Xin. *Liu shi de sui yue: Li Xin hui yi lu*,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Li, Weihuan. *Hui yi yu yan jiu, xia ce*,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zi liao chu ban she, 198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Li, Rui. *Lu shan hui yi shi lu*, Zhengzhou: Henan ren min chu ban she, 2000.

沈瀛，〈回憶父親與父親的回憶——一個青年奔赴延安的生死經歷(三)〉，《文學城博客》，<http://messsdia.chinagate.com/myblog/14602/200701/7429.html>，2016年3月20日檢閱。

Shen, Li. “hui yi fu qin yu fu qin de hui yi: yi ge qing nian ben fu Yanan de sheng si jing li (3),” *wen xue cheng bo ke*, <http://messsdia.chinagate.com/myblog/14602/200701/7429.html>, 2016/3/20 jian yue.

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Jin, Chongji. *Yi ben shu de li shi: Hu Qiaomu, Hu Sheng tan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de qi shi ni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4.

柯六六，〈延安審幹運動中的柯慶施——來自親歷者的回憶〉，《江淮文史》，第2期(合肥，2012.04)，頁78-84。

Ke, Liuliu. “Yanan shen gan yun dong zhong de Ke Qingshi: lai zi qin li zhe de hui yi,” *Jiang Huai wen shi*, di 2 qi (Hefei, 2012.04), 78-84.

袁學之，《難忘的回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

Yuan, Xuezhì. *Nan wang de hui yi*, Zhangsha: Hunan wen yi chu ban she, 2000.

張宣，〈我經歷的延安整風運動〉，《紅岩春秋》，第3期(重慶，2000.03)，頁3-10。

Zhang, Xuan. “Wo jing li de Yanan zheng feng yun dong,” *Hong yan chun qiu*, di 3 qi (Zhongqing, 2000.03), 3-10.

張宣，〈鳳凰驚夢——延安「搶救運動」親歷記〉，《紅岩春秋》，第4期(重慶，2000.04)，頁3-25。

Zhang, Xuan. “Feng huang jing meng: Yanan ‘qiang jiu yun dong’ qin li ji,” *Hong yan chun qiu*, di 4 qi (Zhongqing, 2000.04), 3-25.

張宣，〈為澄清一個史實致廖志高同志〉，《紅岩春秋》，第6期(重慶，2001.06)，頁58-60。

Zhang, Xuan. “Wei cheng qing yi ge shi shi zhi Liao Zhigao tong zhi,” *Hong yan*

chun qiu, di 6 qi (Zhongqing, 2001.06), 58-60.

曹冠群，〈我得益於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收入延安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第1集，頁60-66。

Cao, Guanqun. "Wo de yi yu Yanan zhong yang dang xiao de zheng feng xue xi," shou ru, Yanan zhong yang dang xiao zheng feng yun dong bian xie zu, bian. *Yanan zhong yang dang xiao de zheng feng xue xi*(Beiji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chu ban she, 1988), di 1 ji, 60-66.

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Mo, Wenhua. *Mo Wenhua hui yi lu*,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1996.

郭曉棠，〈郭曉棠遺作選：文革交代材料(五)——1941-1950年我在根據地的情況〉，《至人無為博客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9bd930100pf3i.html，2016年3月16日檢閱。

Guo, Xiaotang. "Guo Xiaotang yi zuo xuan: wen ge jiao dai cai liao (5): 1941-1950 nian wo zai gen ju di de qing kuang," *Zhi ren wu wei bo ke de bo k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9bd930100pf3i.html, 2016/3/16 jian yue.

陳模，〈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黨校〉，《中共黨史資料》，第2期(北京，2008.02)，頁52-69。

Chen, Mo. "Wo suo zhi dao de Yanan zhong yang dang xiao," *Zhong gong dang shi zi liao*, di 2 qi (Beijing, 2008.02), 52-69.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Ceng, Zhi. *Yi ge ge ming de xing cun zhe: Ceng Zhi hui yi shi lu*, xia ce, Guangzhou: Guangdo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8.

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Huang, Huoqing. *Yi ge ping fan gong chan dang yuan de jing l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5.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Yang, Shangkun. *Yang Shangkun hui yi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1.

楊第甫著、唐伯固整理，《吹盡狂沙——楊第甫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Yang, Difu, zhe, Tang, Bogu, zheng li. *Chui jin kuang sha: Yang Difu zi shu*, Zhangsha: Hun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99.

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Bao, Yibo. *Ling xiu yuan shuai yu zhan you*,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2.

聶洪鈞，《聶洪鈞回憶與文稿》，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Nie, Hongjun. *Nie Hongjun hui yi yu wen gao*,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2005.

(三)年譜、日記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nian pu (1893-1949)*, zhong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ou en lai nian pu (1898-1949)(xiu ding be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u, Jiamu, zhu bian. *Chen Yun nian pu*, shang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shi yan jiu shi Zhang Wentian xuan ji chuan ji zu, bian, *Zhang Wentian nian pu*, xia juan,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2000.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bian, *Peng Zhen nian pu*, di 1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Xie, Jiaozai. *Xie Jiaozai ri ji*, xia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4.

Vladimirov, Peter.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四)研究專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1998。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Jin, Chongjizhu, bian. *Zhou Enlai chuan*, di 2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中共中央黨校教育史研究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jiao yu shi yan jiu zu, *Yanan zhong yang dang xiao de shen gan gong zuo*,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3.

《王震傳》編寫組，《王震傳》，上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

Wa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Wang Zhen chuan*, shang juan, Beijing: Dang dai Zhongguo chu ban she, 1999.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He, fang. *Dang shi bi ji: cong Zunyi hui yi dao Yanan zheng feng*, Xianggang: Li wen chu ban she, 2005.

李原，《只為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Li, Yuan. *Zhi wei shi: Yan Hongyan shang jiang wang shi zhui zong*, Kunming: Yunnan ren min chu ban she, 2003.

金鳳，《鄧穎超傳》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Jin, Feng. *Deng Yingchao chuan*, shang c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3.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Qin, Fuquan. *Bo Gu he Mao Zedong: ji Zhonghua su wei ai gong he guo de ling xiu men*, Xianggang: Da feng chu ban she, 2009.

郝在今，《「文革」前史——延安「搶救運動」紀實》，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

Hao, Zaijin. “wen ge” qian shi: *Yanan “qiang jiu yun dong” ji shi*, Xianggang: Li wen chu ban she, 200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Gao, Hua. *Hong tai yang shi zen yang sheng qi de: Yanan zheng feng yun dong de lai long qu mai*,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00.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Chen, Yongfa. *Yanan de yin ying*,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0.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Chen, Yeping, Han, Jincuo, zhu bian. *An Ziwen chuan lue*,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6.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Tian, Youru. Peng Zhen chuan lu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Peng Zhen ch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cow de en en yuan yuan*, Nanchang: Jiang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9.

蕭一平，《延安整風運動：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Xiao, Yiping. *Yanan zheng feng yun dong: hui yi yu yan ji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Luo Ruiqing chuan bian xie zu. Luo Ruiqing chuan, Beijing: Dang dai Zhongguo chu ban she, 2007.

(五) 論文

李向東，〈涉及吳奚如平反的幾封信〉，《炎黃春秋》，第9期(北京，2007.09)，頁74-76。

Li, Xiangdong. “She ji Wu Xiru ping fan de ji feng xin,” *Yan huang chun qiu*, di 9 qi (Beijing, 2007.09), 74-76.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黨史文匯》，第11期(太原，2012.11)，頁15-22。

Meng, Hong, Ren, Yuan, Wang, Yanping. “Peng Zhen: yi sheng shi shi qiu shi yu jian chi zhen li: Dang shi zhuan jia Tian Youru fang tan lu,” *Dang shi wen hui*, di 11 qi (Taiyuan, 2012.11), 15-22.

張文杰，〈延安整風運動中河南黨被康生誣陷為「紅旗黨」的經過及嚴重後果〉，廖蓋隆主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1985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343-345。

Zhang, Wenjie. “Yanan zheng feng yun dong zhong Henan dang bei Kang Sheng wu xian wei ‘hong qi dang’ de jing guo ji yan zhong hou guo,” Liao, Gailong, zhu bian. *Zhong gong dang shi wen zhai nian kan (1985 nian)*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zi liao chu ban she, 1987), 343-345.

郭青苔，〈六十三年前在中央黨校發生的一場政治論爭〉，《愛思想》，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43.html>，2016年03月16日檢閱。
- Guo, Qingtai. "Liu shi san nian qian zai zhong yang dang xiao fa sheng de yi chang zheng zhi lun zheng," *Ai si xiang*,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43.html>, 2016/3/16 jian yue.
- 傅平，〈審幹運動和周恩來〉，《紅岩春秋》，第4期(重慶，2000.04)，頁27-31。
- Fu, Ping. "Shen gan yun dong he Zhou Enlai," *Hong yan chun qiu*, di 4 qi (Zhongqing, 2000.04), 27-31.
- 散木，〈吳奚如的風雨人生〉，《文史精華》，總217期(石家莊，2008.06)，頁22-27。
- San, Mu. "Wu Xiru de feng yu ren sheng," *Wen shi jing hua*, zong 217 qi (Shijiazhuang, 2008.06), 22-27.
-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51期(香港，2013.04)，頁136-159。
- Liu, Zheng, Zhang, Chunsheng. "Cong li shi de ji ge zhong da guan jie kan Peng Zhen he Mao Zedong de guan xi," *Ling dao zhe*, zong 51 qi (Xianggang, 2013.04), 136-159.
- 鍾延麟，〈彭真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6卷第2期(臺北，2014.06)，頁247-292。
- Chung, Yen-lin. "Peng Zhen zai 1957 nian zheng feng, 'fan you pai' yun dong zhong de jiao se yu zuo wei," *Ren wen ji she hui ke xue ji kan*, di 26 juan di 2 qi (Taipei, 2014.06), 247-292.
-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期(臺北，2016.03)，頁99-151。
- Chung, Yen-lin. "Peng Zhen he zhong gong Dongbei ju zheng lun: jian lun qi yu Gao Gang, Lin Biao, Chen Yun zhi guan xi (1945-1997),"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91 qi (Taipei, 2016.03), 99-151.
- 鍾延麟，〈彭真與劉少奇政治關係之研究(1928-196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8期(臺北，2017.11)，頁135-188。
- Chung, Yen-lin. "Peng Zhen yu Liu Shaoqi zheng zhi guan xi zhi yan jiu (1928-1966)," *Guo li Chengc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48 qi (Taipei, 2017.11), 135-188.
- Teiwes, C. Frederick,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339-387.

(六) 報紙

〈彭真同志光輝戰鬥的一生〉，《人民日報》(北京)，1997年5月3日，1版。

“Peng Zhen tong zhi guang hui zhan dou de yi sheng,” *Ren min ri bao* (Beijing), 1997.05.03, 1 ban.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1-1945)

Chung, Yen-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itiated by Mao Zedong was a very important event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istory. It successfully unified the Party under Mao's leadership, and helped the Party to compete with and eventually defeat the Nationalist Party. In this event, another CCP leader, Peng Zhe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However, the CCP's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Peng intentionally avoided discussing his action on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e controversial rescue campaign. Independent academic works have long noted Peng's crucial roles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 However, given the limited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study related to the issue.

Based on newly available materials and recent interview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eng was one of Mao's trusted subordinate during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fter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Peng acted as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who harshly criticized the targets of the movement, including "dogmatists" such as the Soviet-trained leaders Wang Min and Bo Gu and "empiricists" such as senior leader Zhou Enlai and military leader Peng

Dehuai. In doing so, Peng assisted Mao in intimidating these targeted politicians and other high-ranking cadres to surrender to Mao and accept Mao's position as the Party's preeminent leader. Furthermore, Mao relied heavily on Peng to conduct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the cadre examination movem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where many important Party cadres and local delegates of the Party's Seventh Congress studied. Peng endeavored wholeheartedly to carry out Mao's related policie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Mao's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successfully cultivated a group of loyal Maoists. However, during the above process of radical rescue campaign in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many cadres were wrongfully persecuted based on false accusations. While Mao was undoubtedly responsible for the wrongdoings, Peng was also equally responsibl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eeply influenced Chinese politics under the CCP rule after 1949. As a vanguard of the movement, Peng eventually suffered from its backlash personally.

Keywords: Peng Zhen,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adre Examination Movement, Rescue Campaign, Mao Zedong

